

第 50 期（总 50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 目 录

### ■ 新闻动态

|                                       |    |
|---------------------------------------|----|
| 2017 年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培训会顺利召开                 | 4  |
| 北京大学举行清明公祭活动                          | 5  |
| 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巡礼·北大站开幕                     | 7  |
| 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社会学文化节暨京津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举行          | 9  |
| 中德两国三校第五届艺术史工作坊在北大艺术学院举行              | 11 |
| “经世明理 济实鼎新”第六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举行           | 13 |
| 樱花乡里展书法 学府庭中论孔孟——北京大学“书法三人行”早稻田大学特展举行 | 15 |
|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一行来访北大并作主题演讲                | 16 |
| 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 17 |
| 泰国诗琳通公主访问北京大学                         | 19 |

### ■ 网教之声

|                     |    |
|---------------------|----|
| 大数据告诉你：什么样的在线课程最受欢迎 | 22 |
| 在线课程不是简单让学生在线学习     | 26 |

### ■ 北大人物

|                        |    |
|------------------------|----|
| 仁者百年——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的世纪人生 | 32 |
| 黄晓军：大医生之路              | 38 |

■ 学者谈读书

陈寅恪的读书方法——不动笔墨不读书 -----50

陈平原：“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 -----52

■ 好文共赏

“山水”没落与现代中国艺术的困境 -----57

■ 史苑钩沉

朗润园旧事：少小离家老大回 -----63

■ 大美北大

花明叶软燕园春 -----67

■ 学员心声

上下求索 -----70

## 编辑寄语

2017年4月16日，被称为中国围产之母的严仁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走完了自己104岁的人生，她在医院里一直工作到95岁。

本期北大人物选文《仁者百年》缅怀这位经世济民的医者。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鹁、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 2017年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培训会顺利召开

4月12日上午8:30, 2017年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培训会在电教楼125室顺利举行。会议主要是对全校从事继续教育的分管领导和业务人员进行相关政策的培训。会议由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刘力平同志主持, 与会人员共计120余人,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副处长郭大勇同志应邀参会。

刘力平介绍会议议程后, 郭大勇作为嘉宾介绍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的总体情况, 包括2016年取得的工作成绩和2017年的工作要点。之后,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章政以提问形式就继续教育在高校的发展等多个方面与郭大勇作了交流。



郭大勇介绍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的情况



章政进行提问

随后, 北大继续教育部副部长杨学祥对《北京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和《北京大学关于严格规范举办领导干部参加的培训项目有关事项的实施细则》进行了逐条解读, 对一些经常出现和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明确和强调。



杨学祥解读相关规定

最后, 刘力平作会议总结发言。他

简单介绍了学校面临的总体形势和主要任务，分析了以往存在的问题，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严谨诚信；爱岗敬业，以专业的从业水平认真做好培训；立足长远，加大品牌建设力度；为维护好北京大学声誉努力工作，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



刘力平总结发言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北京大学举行清明公祭活动

2017年4月4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同志就义90周年赋予了今年清明节特别的背景。上午9时，伴随着熹微的晨光，北京大学师生代表来到静园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清明公祭活动。校党委书记郝平、校长林建华等校领导班子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基层红旗团委教师，院系党团支部书记，团校优秀学员，国防生、飞行学员和国旗班成员等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清明公祭活动现场

清明公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北大师生手持黄白菊花，向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北大革命先辈们默哀致敬。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中，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纪念碑建成于1993年5月4日，纪念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直

至抗美援朝期间，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师生校友中牺牲的 96 位革命烈士，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

默哀结束后，进入朗诵环节。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北大青年学生代表先后朗诵了由北大学生原创的缅怀革命先辈的诗篇《青松礼赞》和追念李大钊同志的著名革命诗篇《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节选。

2009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要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莫再说彼时满目疮痍，镰刀锋利，斧头拿起，九十年前的盘古正在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饱含深情的朗诵，让人回忆起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如青松一般刚毅卓绝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信仰

书写的光荣历史。百余年来，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光荣传统的激励下，一代代北大青年前赴后继，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



校领导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整理挽联

随后，郝平、林建华代表北京大学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挽联整理后，全体师生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鞠躬三次，依次敬献鲜花并逆时针环绕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活动最后，师生们前往李大钊同志、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祭奠并依次献花致敬。



师生向李大钊雕像献花致敬

清明公祭活动是由北京大学团委主办的、全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品牌活动。每年清明节，北大师生代表都会相聚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和雕像前进行祭奠，以此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活动对培养北大师生爱国荣校的情怀、弘扬革命精神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代代

先辈用生命和信仰铸就的光荣革命传统，始终激励着北大人不懈努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进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巡礼·北大站开幕

2017年4月13日下午，山西高平宣传部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举办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巡礼·北大站”开幕式暨“高平文化复兴联盟”签约仪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功举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曹宏、考古文博学院党委副书记金英、考古文博学院团委书记户国栋，中国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王齐，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岳洁琼、修复研究院院长王颖生，故宫博物院知名学者孟嗣徽，中新社原社长、中国新闻研究院院长郭招金，山西省高平市市委书记范兆森、人大主任张志刚、政协主席

李培安、宣传部部长牛晓明、市委办公室主任郜培法等出席本次开幕式暨签约仪式，中国文博界著名专家、95岁的谢辰生先生作为见证签约特邀嘉宾也莅临现场，高平市市长邹树琦主持仪式。

吴志攀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大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与学术氛围，考古文博学院等文科院系更是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创作于北宋年间的高平开化寺壁画则是集厚重的文化价值、精湛的艺术价值与珍贵的史料价值于一身。北大与高平开展深度合作，有利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文科院系开展学术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精神，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不断进取。



吴志攀致辞

范兆森指出，高平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为山西省文物大市之一，开化寺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壁画。高平举行开化寺壁画展与“高平文化复兴联盟”签约仪式，旨在与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高平文化走出太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牛晓明随后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本次展览与“高平文化复兴联盟”成立的背景。

王颖生表示，高平开化寺壁画是壁画艺术宝库中令人惊叹、堪称孤品的瑰宝，成立“高平文化复兴联盟”意义深远，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愿与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高平市一道，发挥

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合作，继承弘扬好山西高平壁画所蕴含的深厚文化。

随后，“高平文化复兴联盟”四方代表杭侃、王齐、王颖生、牛晓明签署协议，随后代表们与范兆森、谢辰生先生为展览开幕并合影留念。

最后，牛晓明引导各位来宾参观展览，对各件作品、各个单元的设计以及幕后花絮进行了介绍。

据悉，本次展览展出时间是4月6日至4月20日，展览共分高平气象、经典千年两个部分，分别对高平丰富的历史遗迹和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北壁壁画内容进行了展示和解读。



嘉宾合影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社会学文化节暨京津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举行

2017年4月8日至9日，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社会学文化节暨京津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于北京大学成功举行。京津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是由北京八所高校于2015年联合发起，全部由本科生参与，旨在凝聚社会学青年的学生学术交流活动，至今已成功举行了三届。今年，为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学学科建设，本届论坛邀请了南开大学参加，影响力覆盖了北京、天津的十所高校。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协办。论坛分为开幕式、系列分论坛、社会学辩论赛以及闭幕式四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十所学校社会学院（系）的300余名师生参与。

本届论坛以“转型社会”为主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背景下，发展是现代的永恒主题，也是近代社会转

型的目标和方向。作为社会未来的象征、时代转型的直接感知者和承担者，当代大学生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意义从自身命运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好奇和责任感。以此为题，不仅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历史经验的吸收、未来情景的预知，同时也是社会学知识体系完善不可或缺的部分。



论坛开幕式嘉宾合影

8日，论坛于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顺利开幕。继致欢迎辞、往届论坛回顾等环节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冯仕政教授进行了题为“制度沉积与制度变革”的精彩讲座，引发了在场嘉宾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响。



冯仕政教授作讲座

8日下午，“时代变迁与社会新常态”“转型挑战与制度回应”两场主题分论坛同时举行，十校师生就《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家长陪读群体经历及其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例》《角色与展场：同志酒吧的“空间——互动”研究》《征兵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三个高校征兵动员的调查》《农民上楼的行为选择差异研究——基于华东王村的调查》《在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从“被需要”到“求发展”的变迁过程》《角色失调：政商关系中的权力寻租——以央视两部反腐纪录片为例》《从“麦难民”看中国流浪者救济制度供需对接现状与发展方向探讨——以中关村一带 24 小时快餐店为例》《单位制下垄断国企的福利依附性分析——以山西某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医疗保险为例》等 14 篇学术研究成果展开了分

享与讨论。在交流中，社会学青年们思维激烈碰撞，相互融合，共同进步，展现了当代社会学人的别样风采。从作品中体现出的同学们对社会问题的敏锐与社会责任的担当受到了在场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9日上午，来自南开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的同学们就“高考改革是否有利于教育公平”“实体书店是否会消亡”“大学排行榜是否能促进教育发展”等辩题展开辩论，辩手们在激烈的辩论中进行了语言的切磋和思想的交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下高校社会学系学子们的精神面貌与优秀风采。

9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进行了题为“文明是副产品”的讲座。他从外婚制、农业起源、造纸术以及印刷术等角度入手，以怀疑的精神打破常规，给大家另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踊跃提问，郑老师也耐心回应，不同思想的碰撞给本届论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论坛圆满落幕。

自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和中央 31 号文件发布以来，社会学系即把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文件指出要加快完善具有中

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社会学学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全系研究认为，举办高校间的社会学学生学术论坛，各学校社会学相关院系进而深化交流合作将是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来自京津高校乃至全国的社会学青年得以展现自

身风采，思想间激烈碰撞，助力世界一流社会学的建设。在本届论坛中，各校师生充分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到了实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中德两国三校第五届艺术史工作坊在北大艺术学院举行

2017年4月7日至8日，第五届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浙江大学艺术史工作坊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德国的16位艺术史学者共聚一堂，以“画中之音与画外之意”为主题，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展开讨论。



工作坊现场

该艺术史工作坊于2014年由北京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共同发起，2016年浙江大学加入，至今已成功举行了五届。

4月7日上午，首先由北京大学的李淞教授、丁宁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的李静姬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的黄厚明教授分别致开幕辞。此后便由丁宁老师第一个演讲，题目为《听不见的雷声意味着什么——乔尔乔内的〈暴风雨〉的解读与挑战》，画中“听不见的雷声”似有“惊蛰”之意。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之研讨正式启动。

就工作坊中大家提交的16篇论文来看，分布相对比较均衡。

就地域而言，东亚、西亚、欧洲均有相关研究文章。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有丁宁老师的上述论文，关于西亚艺术的有北京大学贾妍老师的《寂静之声：乌尔“琴语”及苏美尔葬仪初探》，关于东亚之日本艺术的有柏林自由大学 Annegret Bergmann 的《图

像中的音乐——想象的音乐：恩地孝四郎的艺术观念》。其它发表文章都是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主题。

就时间而言，从上古到现当代均有文章讨论，以讨论时间为序，如贾妍老师的文章讨论公元前数千年两河流域的乌尔琴图像；浙江大学黄厚明教授的《观者的目光》则主要讨论两汉及此前图像呈现的视觉化进程；原属浙江大学的谈晟广（现在清华大学）的论文《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研究两汉时期动物图像中政治观念的表达；浙江大学陈谷香老师《世有解语花，凭谁解花语》讨论传为唐画的《簪花仕女图》的主题；讨论宋代艺术的有北京大学李淞教授的《弦外之音——关于宋徽宗〈听琴图〉的柔性想象空间》和北京大学白巍老师的《鹤鸣于九皋——马和之〈清泉鸣鹤图〉释读》；于元代之艺术，则有浙江大学黄杰老师的《王蒙〈丹山瀛海图〉山水原型为南通狼山考》；浙江大学赵晶老师《周全〈狮子图〉研究》则讨论明代之绘画；研究清代绘画的有：柏林自由大学何小兰女士的《肖像的谱写——探讨清代绘画〈王梦楼抚琴图〉的音乐功能及意义》，北京大学高译老师的《无间于外，无息于内——由〈古木垂阴图〉解石涛山水之音的审美内涵》；北京大学翁剑青《画里画外的声音——〈延安新春〉之释读》

研究的是数十年前的画和事；柏林自由大学 Heike Frick 的《声音与倾听：刘海明的版画》则将目光聚集于活在当下中国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另外，本次工作坊中还有一些文章以某一概念为中心，铺陈展开。如柏林自由大学李静姬老师的《通感：倾听中国山水画中的声音》，通过中国传统山水画来讨论绘画中的通感；北京大学刘晨老师《可视的声音》探讨中国双关图像及其源起，关注的是与“双关”这一概念相关的图像。

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主办，并得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工作坊展现了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增进了两国三校艺术史学者的交流，消除了一部分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学术信息讹误，推进了相关主题的艺术史的深入研究，也使得北大艺术史论的学生获益匪浅。

4月7日晚，李静姬教授在北大静园二院为艺术学院师生献上了精彩的讲座，题目为“高丽佛教绘画及其在欧洲的流传”，演讲的内容是李静姬教授多年来研究积累的成果。高丽佛教绘画现存世一百多幅，在本次讲座中她重点介绍了藏在欧洲的八幅，并带领大家仔细解读了画中的图像特征。她将高丽佛教

绘画与中国、日本相关绘画区别开来，解决了艺术史上长期困扰大家的难题。国内对高丽佛教绘画一向所知甚少，此次演讲开拓了大家的眼界，增进了国内艺术史研究者对朝鲜半岛古代绘画的了解。

艺术史研究所东亚艺术史系主任。其研究领域涉及亚洲艺术的多个方面，尤其是文人艺术、佛教艺术及丝绸之路艺术。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延伸阅读：

李静姬教授，1991年于科隆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至2007年任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2003年任柏林自由大学

## “经世明理 济实鼎新”第六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举行

2017年4月7-8日，“经世明理 济实鼎新”第六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是2012年北大经济学院在百年院庆时创办的，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类本科生学术盛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论坛开幕式全景

论坛开幕式在4月7日下午举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校友韩文秀，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北京大学团委书记陈永利等嘉宾和领导出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20余所高校的71名学术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寇腾腾主持。

开幕视频首先回顾了前五届论坛的举办情况，展现论坛自举办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聚焦的改革热点及青年经济学人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叶静漪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北京大学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赞扬了论坛取得的成绩，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孙祁祥教授为论坛致开幕辞。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 2014 级本科生刘家瑞作为学生代表发言。随后，韩文秀、叶静漪、孙祁祥、陈永利共同展开主题卷轴，宣布论坛正式启动。



论坛开启

开幕式最后，韩文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与经济学”为题，作主题学术报告，勉励青年学子不断进取。



韩文秀作主题学术报告

4 月 8 日上午，五场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同时举行。

下午 4 点，论坛举行闭幕仪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董志勇，

院长助理秦雪征，团委书记王宜然出席闭幕仪式。闭幕式由经济学院 2016 级本科生郭泰鼎主持。秦雪征副教授致闭幕辞。学术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4 级本科生承子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4 级本科生李春海做总结回顾。最后，与会老师为荣获“优秀学术代表”称号的同学颁发了证书。至此，“经世明理 济实鼎新”第六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一坛既开，揽天下英才；继往开来，复稷下学风。论坛活动中，有无数次思想交锋碰撞出真知灼见，有无数次齐心协力创造出累累硕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勇担育人重任，始终如一地为青年经济学人搭建展示自我、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科学的繁荣以及青年才俊的成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樱花乡里展书法 学府庭中论孔孟——北京大学“书法三人行”早稻田大学特展举行

当地时间 2017 年 3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办公室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的鼎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书法三人行”早稻田大学特展在早稻田大学顺利举行。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铎，早稻田大学北京教育研究中心所长杨振，书法三人行代表陈洪捷教授、牛耕耘教授，北京大学汉推办项目官员任燕飞博士等参加了开幕式活动。



展出书法作品

本次特展活动展出“三人行”书法作品 30 余幅，主题涵盖北大精神、早大精神和中国文化三方面内容。张国有教授书写蔡元培先生的“研究学术”、鲁迅先生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早稻田大学校歌“仰望不变的理想之光”；陈洪捷教授书写“一塔湖图”、理学家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

以及牛耕耘教授书写黄侃教授的“四海为量，千载为心”等作品散发着中华文化的墨香，也搭建起中国书法和日本书道沟通的桥梁。



合影

本次书法特展活动是汉推办 2017 年度重点首推的“文化走出去”高端精品人文交流项目。“三人行”此次东渡日本，来到美丽的早稻田大学，可谓“樱花乡里展书法，学府庭中论孔孟”。“三人行”作品以独特的书法内容与形式得到早大师生的广泛赞誉。去年，为庆祝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建成 10 周年活动，“三人行”远赴柏林成功主办“宣纸上的北大精神”柏林展。今年，“三人行”行至东京却不止于此，今后还将

为传播北大精神、弘扬中国文化而继续行走。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一行来访北大并作主题演讲

2017年4月12日上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和副校长吕坚一行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了来宾。双方就进一步开展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等事项交换了意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副院长王奇，工学院院长张东晓，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胡敏，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王勇等陪同会见，并介绍了两校在相关领域的合作。

《心件：大学校长说教育》新书发布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王杰出席发布会并致辞。王杰指出，北京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多年，并在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3月郭校长到访北大时，两校就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建立了多层次的学生交流机制，每学年互派10名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一个学期。此次《心件：大学校长说教育》一书的发布更是凝结了郭校长多年学校管理和学科建设的深刻思考，他衷心希望郭校长的著作和理念能够影响更多的大学同仁。发布会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环境模拟与污

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联合主办，香港城市大学校友、北京大学师生等共12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王杰致欢迎辞

随后，郭位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大学教育国际化已既成事实，并将不断深化。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大陆、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在硬、软件上基本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评比中也有所进步，但仍缺乏创新人才，“原因在于心件上的缺陷”。“心件”指的是“教育者及其他与教育相关人士的一种心态，一种专业精神和专业文化，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一种需要时间去学习、去沉淀的气质”。他同时指出，两岸大学的缺憾是可以向世界各国先进大学学习而弥

补的。这些大学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有：远离政治干扰的学术氛围、教研并重、产学研结合、多元化、唯才是用、分层负责、同行评比、鼓励创新和创意、教授执教自主性等。

郭位的演讲风趣而轻松，他通过大小事例道出心件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国内高等教育的深刻思考，现场气氛活跃、讨论热烈。



郭位发表主题演讲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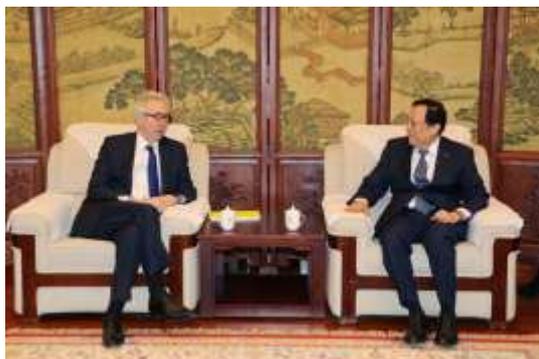
## 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2017年4月3日上午，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来北大访问，副教务长Tsu-Jae King Liu、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叶文心、公卫学院院长Stefano Bertozzi、化学学院院长Douglas Clark等随行来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郝平，校长林建华，副校长李岩松，副教务长李沉简，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吴云东，教育学院院长陈晓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朱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院长高毅勤等会见了来宾。

郝平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对杜宁凯校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伯克利是北大极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学术研究、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两校师生互访交流频繁。杜宁凯表示伯克利与北大两校友谊深厚、合作紧密，去年9月林建华校长一行到访伯克利时，两校即在环境、公共卫生、新材料等领域签署合作备忘

录。此行访问北大，他期待推动更多校际合作的落地与实施，让两校成为美中两国间沟通的大使。



郝平会见杜宁凯

在与林建华的会谈中，双方探讨了新的学生培养模式，以及争取社会资源资助学校建设的途径等议题。各领域学者也介绍了已有合作进展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林建华表示，已有的合作只是一个开端，两校将持续支持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

当日，杜宁凯前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表演讲，演讲会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教授主持。杜宁凯系统梳理了二战以来，美国大学逐步拓展并建立起全球知识网络的历史脉络，并讨论了亚洲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大学间的合作极为重要，

应求同存异、探索多元化的协作方式，而网络课堂也将成为实体教学的有效补充，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演讲会现场



杜宁凯发表演讲

演讲结束后，杜宁凯接受了北大学生记者的采访，两校相关领域教授就全球健康、新材料、国际研究等议题展开分组讨论。（文/谢宇程阳）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泰国诗琳通公主访问北京大学

2017年4月8日，泰国诗琳通公主来到北京大学访问，泰国驻华大使毕力亚·针蓬、中国前驻泰大使管木等陪同访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郝平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了公主一行，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副校长李岩松，相关院系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见。会见后，公主接受了北大120周年校庆纪录片《与北大同行》拍摄组的采访，并访问和参观了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和生物标本馆。



中泰学子欢迎诗琳通公主到来

会谈中，郝平对诗琳通公主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公主是北大的老朋友，在推动中泰两国友好交往，增进中泰友谊，促进两国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郝平说，北大正在积极推动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借助这个平台，将进一步开展以面向泰国为主的合

作交流活动，拓宽现有语言文学、文化、中泰关系等领域。郝平表示，公主亲自推动北京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合建孔子学院，并且一直关心、支持优秀泰国学子求学北大，对此，北大将继续深化与朱拉隆功大学间的密切合作，并在奖学金评定等方面支持在北大学习的泰国学子。最后，郝平还邀请公主参加明年北大的120周年校庆活动。



郝平与诗琳通公主会谈

诗琳通公主对于北京大学的精心安排表示感谢。在会谈中，公主向郝平介绍了几位毕业于北大的泰国留学生在泰国的工作情况，并感谢北大对泰国学子的关心与培养。公主表示，今年，朱拉隆功大学刚刚迎来100周年校庆。回顾过去，两校间的交流与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朱拉隆功大学校长曾多次带领理工院系代表团访问北大，两校生命科

学及纳米领域的学者之间联系尤为密切，孔子学院的建立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她希望在两校的共同努力下，未来泰中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向诗琳通公主赠送礼品

会见结束后，诗琳通公主在留言簿上留言。郝平向公主赠送了北大女校友崔婧和女教授林小英的书法作品劝学诗《四时读书乐》和《眼底未名水》。公主回赠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随后，诗琳通公主在郝平、李岩松陪同下来到了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北大校友会秘书长、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李宇宁介绍了双创中心创立宗旨和过程以及为北大师生创新发挥的作用。创新创业研究院（筹）院长陈东敏教授介绍了北大创新创业课程培养体系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生态链情况。公主认真聆听了两位负责人的汇报。公主随后来到学生创业办公区，来自泰国留学生校友曾增金（Paruja Chukiatkaohn）

和北大在校博士生王绍鑫分别介绍了“目标管理工具-奋斗记”和“智能空气净化器”创业项目。在公共交流区和极客实验室，北京大学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基男、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陈江教授分别向公主介绍了北大机器人创新团队和极客实验室，并由学生向诗琳通公主展示了机器鱼和无人机创新项目。公主对于北大学子的创业精神和创新项目给予了高度赞赏，并为双创中心亲笔题字“青年力量”。



诗琳通公主题写“青年力量”

之后，诗琳通公主一行赴北京大学生物标本馆参观。生命科学学院许崇任教授和贺新强教授分别向公主介绍了北京大学生物标本馆的历史以及动物标本、北大植物标本和生物进化演变。公主仔细聆听了讲解，并饶有兴趣地向两位教授提出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参观后，公主为标本馆签名留念。（文/王岩）

### 相关链接:

泰国诗琳通公主是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也是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自2001年至今，公主几乎每年都到访北大，关心支持北大的建设发展，大力推动北大与泰国高校及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2005年北大成立诗琳通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诗琳通公主出任中心名誉主席；

2007年北大与朱拉隆功大学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公主亲自出席揭牌仪式。诗琳通公主的本次来访将进一步促进中泰友好关系，并推动两国之间教育、科研及文化交流合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网教之声

### 大数据告诉你：什么样的在线课程最受欢迎

让学生更投入地学习是教师的职责之一。最近有两篇分别基于 Coursera 和 edX 数据的论文令国内学术界大为感兴趣：两篇论文从课程制作和授课过程（运营）两个角度分析了如果提升学生的活跃度。有些结论显而易见，有些结论令人惊讶，对开课教师以及平台设计和运营都很有借鉴意义。

#### 短于 6 分钟的视频最吸引人

微课之微在于其短小精悍，那么长时间的微课视频最能吸引人？

基于 edX 数据的统计，无论视频多长，用户实际观看时长的中位数都不超过 6 分钟。而且 6-9 分钟长的视频是个拐点，更长的视频实际观看的中位数反倒会下降。比如长度超过 12 分钟的视频，实际观看中位数只有 3 分钟。所以，“微视频到底多短最合适”这个问题有了标准答案——6 分钟。这个数字挺难让人接受的，因为按多数老师的习惯，6 分钟根本讲不了什么东西，15 分钟都勉强。但和下一个结论联合分析，其实未必真做不到。

一项面向我国中小学首届微课大赛参赛微课视频时长的数据分析表明：3-7 分钟为最佳时长，太长效果不好，太短则讲不清或视频编辑技术要求高。即 87% 以上的微课教学视频长度都小于 10 分钟。其中 75% 的视频时长在 5-8 分钟之间，小于 3 分钟的则不到 6%，超过 10 分钟的不到 13%。可以看出，中小学微课视频长度最长不宜超过 10 分钟，5-8 分钟最为适宜。不同学科、不同学习对象略有不同。

#### 语速快很关键

视频短小又要包容足够的知识点，微视频的语速也很重要。

虽然统计数字表明语速和视频吸引力并不完全成正比，但当语速达到每分钟 185-254 个单词，对应中文我估计少说得 300 个字时，无论视频多长，比较能获得更多注意力。原因很好理解，快语速常常伴随着激情，激情富有感染力，感染力更能打动学习者，让他更加专注。所以，教师越热情，甚至是激情，越能吸引学生。

语速加快，讲授同样内容所需时间就会缩短，这样产出的视频就可以接近甚至达到6分钟的建议长度了。只要课前做好规划，让内容更紧凑，节奏更快，不说废话，不机械重复（学生可以自己重复看），剪掉“嗯”、“啊”等口头语，短小精悍的视频就有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同样内容的教学视频，越短，学生的学习效率越高。这就是微课视频制作必须要求老师具备的“语言观”。微课视频大多数摆脱了在嘈杂的课堂教学情景中摄制的方式，而采用“可汗学院式”视频（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话筒、一个PPT课件的一对一辅导的录制方式），只录教师讲授的内容及操作（一般用鼠标或手写板代替），而教师讲课时的头像和肢体动作不录进微课视频中。这就要求老师的语言必须声音清晰、发音标准、语速适当（甚至可以偏快，因为学生看视频时对于偏快偏难的地方可以暂停或重复观看）、富有感染力，甚至可以适当幽默风趣一点，能把电脑面前学生的眼球和注意力吸住。

### 教师头像绝非可有可无

微课十分短小，要做得精致，讲课教师的头像并非可有可无。

对大于6分钟的视频，有教师讲课头像的和纯PPT、软件操作等录屏式微课视频相比，前者收获的关注更多。我想，这是因为头像总在动，比一直处于静止画面的单调录屏更提神吧。我个人确实比较喜欢那种头像嵌入视频一角，即画中画的形式，但前提是PPT把那一角特意留出来，头像不会遮挡该看到的课件内容。

关于头像，我们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不必完全照搬可汗学院式视频的方法，教师的头像在某种教学情景下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况且中国学生受传统的班级教学影响深刻，没有头像的课，教师自己看着不习惯不自然，学生更会觉得，没有老师的现场感和亲切感及监督，自主学习能力减弱，学习一段时间后估计也容易分神。因此，中国式微课视频可以走“折中”路线——教师头像可以在片头片尾出现，中间偶尔出现，重要内容时可以出现，小结时也可以出现，甚至教师头像的画面位置和大小都是可以设置的。而这种在CS录屏软件的后期编辑中是很容易实现的。

### 要善于制造一对一的感觉

教师都习惯于教室的教学气氛——黑板/大屏幕、教鞭或PPT激光笔、站在

讲台上、走来走去、学生全部面向教师，甚至安排一些学生假装听众来提起讲课的兴致。但数据分析表明，这种在教室/演播室配置昂贵设备录制的视频，在吸引力上其实不如更低成本的私人录制方式。教师坐着，面对镜头，背景就是办公室，像在做单独辅导一样地讲课，效果是最好的。这样很容易产生一种亲切感，而且与坐在电脑前的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最契合。

这里的关键点就是让学生有一对一的感觉。传统线下教育提示我们，面对面、一对一才能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坐下来直面镜头，就基本创造出了这种感觉。语言上再多用“你”而不是“你们”，用“咱们”而不是“大家”，气氛就有了。很多不谙此道的老师课程开头第一句话总是“同学们，大家好”，这通常在那一刻就“出戏”了。

这点很重要。微课就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一对一高效学习而设计制作的，是给学生看的而不是给老师看的。一对一学习里蕴藏着最扁平化的学习理念——学生直接与学习内容或讲解操作过程交互，没有多余的、无关的甚至是无效的中间教学环节，如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与同学讨论、分享、交流、回答，即使有，也是学生在心里、一个人的思考与

活动。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风格按需学习——容易的内容可以跳着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看、暂停着去查相关资料弄明白相关基础知识后接着看，看的时候可以线上提问题、做练习、做笔记，100%掌握后再看下一个微课。这样的学习效率就特别高，且不会遗留下空白，差生就再也不会形成。

### 手写屏笔是最值得购买的录课设备

可汗学院的视频是典型的手写笔（板）应用，所以有学者干脆将这种视频称为“可汗风格”。统计表明，与传统单纯的录屏式微课相比，学生更愿意在可汗风格的视频中投入 1.5-2 倍的时间。老师边讲边画，确实很像一对一讲题的感觉。或者在一片白板/黑板上用板书讲课，或者在 ppt 上勾画要强调的内容，手写笔的效果远胜过鼠标单一的指示与播放，它让学生很清楚地知道该看哪里，并忠实地跟着老师的思路同步思考，从而实现学习过程思维的可视化。

对于数理化偏理科或美术科的老师来说，一支几十元或者高档的几百元的手写笔实在是太值得投入了。

用鼠标是很难“写”出好板书的。手写电磁屏和手写笔是非常值得配备的微课视频录制工具。

### 学生越活跃，成绩越高

什么时候选课的学生最活跃呢？研究表明：在新课程正式开始前半个月，到课程第一次作业截止这段时间里选课的学生，其中的活跃者比例远高于其它时间选课的。所以，MOOC 课程宣传的最佳时机，就是开课前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自开课时间起，哪怕到了课程结束之后，加入到课程但只看视频的学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例。他们虽然不交作业、不考试，但也能从视频中有所得，这也是课程价值的体现。所以有些 MOOC 课程结束后就彻底关闭、连视频都不给人看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另外，60% 的学生是在课程开始前选课的，所以足够长的预告期还是有必要的。

基本上，学生的最终成绩和他在看视频、做测验、交作业和参与论坛互动的次数是成正比的。也应了那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老话。但“读论坛”这项活动有个独特现象，在 80-100 分这个区间会变成反比，也就是分数越高，论坛看得越少。这说明学霸对论坛的依赖不高。论坛主要服务于非学霸。但不要以为学霸对论坛就没贡献，事实上他们很重要。统计数据表明，占据论坛沙发的学生其论坛活跃度都很高（侧面说

明人数少），而且他们的平均成绩也在 80 分之上。

统计表明，并没有任何视频成为明显的学习终结者，但确实有些作业题目成为障碍，大量的学生被挂在上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说明学习中止的很大原因是遇到困难，而非单纯的懒惰。如果能在解题过程多提供一些帮助，如志愿者在线辅导答疑、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推送、定期的学习诊断报告与建议、进阶式积分式的学习激励机制等，可以帮学生走得更远。

这两篇论文的分析虽然还谈不上全面、严密，他们自己也坦诚有漏洞。但瑕不掩瑜，这些结论还是很有指导性，并引人思考的。它们坚定了一个观点——一定不要把课堂讲课的习惯与模式照搬到在线课程中。

授课是一项以对象和目标为导向的活动，在线课程的授课对象构成更复杂，包括年龄、基础、地域、作息习惯、文化背景等，学习目的也多样，如拿证、深入学习、大体了解、解决手头问题等，再加上学习工具与环境的剧烈变化，可想而知照搬课堂授课的效果会多差。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涉足在线教育，并放下自己赖以成名的传统教学

习惯与观念，用“小白”的心态重新学习如何在线授课，是扎实的第一步。

来源：腾讯教育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在线课程不是简单让学生在线学习

自 2013 年“慕课”在中国“发迹”以来，在线课程带来了高校教学改革的一次高潮，国内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在线课程或者混合教学课程，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把这些在线开放课程纳入学分认定机制，在线课程已经变成了高校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不过，在在线课程方兴未艾的同时，付费刷课等不良现象也在部分高校出现，引起人们对于在线课程的质疑。专家指出，对于慕课等在线课程，也要一分为二来看。高校在开展在线课程时一定要提升教育质量，注重把在线课程同教学管理、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相结合，而不应是简单只让学生学习在线课程。

早在“慕课”在国内高校兴起之时，北大等高校就开始酝酿把在线课程纳入学分认定体系之内。

北大当时就宣布，2013 年秋季学期，第一批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程将上线，

在校生完成学习要求可获课堂教学等值学分。

据媒体报道，2014 年 7 月，清华大学物理系约 200 名学生参加了《电路原理》课程的期末考试，并最终顺利取得了学分。据了解，《电路原理》是清华大学上线的第一门慕课，也成为了清华大学第一门以在线课程和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可以取得学分的课程。

记者从北大、清华、复旦等知名高校师生处了解到，目前这些承认学分的在线课程中，既有通识类课程也有专业课，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虽然这类课程的数量现在并不算很多，但已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也引起了师生的注意。

北大大四学生小雨(化名)在大三时就修过 4 学分的《社会调查与研究》课程，据她介绍，这门课就是线上自学与线下讨论相结合，“一周要看完 3 到 4 个视频，视频中间还要做一两道题，期

中期末考试也是线上完成的。”小雨说，讨论环节既有线下分小组讨论，也有线上讨论区的讨论，这两个讨论环节都是要计入成绩的。

在小雨看来，这种课程的好处是能够利用零散的时间来学习，不用来回跑。课程相对也很精炼，老师不会讲那么多“废话”，还可以回看。但自己看视频很容易走神，感觉吸收效果没有线下好。“我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线下课堂会更好。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来看，线上课程性价比更高，可以多听多看。”

记者从部分高校了解到，一些学校在线课程或者混合教学课程的效果还是得到了师生的认同，学校在线课程不断发展，选课人数也日益增多。

按照之前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在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2015 年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联盟已累计开设联盟委托运营课程近 200 门，覆盖全国 1000 余所高校的 1000 万在校生群体，其中近 50 万学生通过联盟课程获得了学分，累计有超过 100 万大学生修读了学分课程。

北大校长助理、北京大学 MOOC 负责人李晓明也曾表示，对于大部分课程来说，利用“慕课”资源开展混合式教学，一定比传统课堂要好。这样的教学方式

充分利用了课堂的时间，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学习的灵活性，而且让老师也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一次备课，多次使用。部分伴随着高校在线课程的发展，质疑声似乎也从未间断。比如在线课程的完成率，比如学生并不认真对待在线课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学生就认为学校的在线课程很“水”，大家都不是很重视，只是觉得“好混学分”。有的学生甚至连视频都不愿看，直接去考试。

据报道，福建某高校推出的网络选修课，甚至被学生付费刷课。“一些同学在网上花钱购买了一条龙服务，考试获得了高分，而那些老老实实上网看视频学习的同学，考试成绩反而不理想。”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娟在 edX 平台开设有《民俗学》课程，这门课也是北大发布的首批网络公开课程，通过考试可获得学分。王娟指出，对于这门课，学生如果没有看过视频是很难答完考试试题的，而且学生还需要把作业放到网上，由其他学生来打分。“学生要自己做调查，做访谈，搜集整理故事，还要参与讨论。”在王娟看来，这样的课不可能轻轻松松甚至不看视频就通过。而对于不认真学习的学生来说，在线下课堂中他可能也不会好好学，这不一定是线上课程的问题。

“对于在线课程是否能计入总分，需要整体考虑。由于每个大学教育课程都有其系统性，还有其教学管理和课程要求，不能采用与社会大众同样的标准。”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陆昉指出，高校要利用在线教育促进教学改革，而不是简单替代现有的教育，所以高校一定要把在线课程与教学管理、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密切结合，有组织地开展教学，提升教学质量，而不是简单让学生完全在线上完成学习就能拿到学分。“像复旦目前所做的都是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情况，促进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陆昉认为，在线课程推进的是整个教学模式的改革，涉及到学校、教师、学生等各个层面。学校要有相应的规划、政策和措施，教师和学生也需要转变观念。

### 学生感受

#### 辅助类课程适合线上授课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新闻系大一学生王子乔今年选修了一门在线课程——军事理论课。这也是他大学生活

中接触到的第一门在线课程。修完这门课程，他就能获得2-3个学分。

王子乔说，军事理论课之前都是课堂授课，从今年开始才改为在线授课。目前这门课已经出了五章节内容，每章节内容时间都不是很长，基本控制在15-20分钟，王子乔说自己已经学习到第三章了。

对于在线课程，王子乔说比较受学生的欢迎，“上课的时间比较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学习时间。”但王子乔也承认，这种授课模式的劣势就是互动性少一些。“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效果如何以及考试，没办法及时反馈。”

王子乔说，目前自己就接触到了一门线上课程。自己是学新闻的，专业课是有必要随堂上的，但诸如思修、心理等一些辅助类课程都可以采取线上授课的形式。“这样我们的选择和时间会相对自由一些。”

对于目前存在的付费刷课现象，王子乔认为，首先目前在线课程都是一些选修课程，没必要刷课。其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避免，“比如我们这节课17分钟，在5分钟或者8分钟的时候，会停顿一下，出一道题让你解答，如果刷课的话，整个课程就无法顺畅进行下去。”

### 混合教学保证学习效果

2013年是“慕课”在国内高校开始蓬勃发展的一年，复旦大学就在这股“慕课”潮流的前列。从2013年春季学期开始，复旦就不断推进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教学改革。2014年4月，复旦大学登录全球MOOCs平台的首门课程《大数据与信息传播》，正式上线Coursera平台。

在向全球发布复旦的特色课程同时，复旦也特别注重利用在线课程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

“我觉得有必要把一些观念讲清楚。实际上我们从来不是想做好简单的在线课程，让学生们去学，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在线课程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陆昉指出，复旦发展在线课程最重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而不是赶慕课浪潮，所以复旦开始探究的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课程的改革，即在线教学资源+翻转课堂教学。通过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转变教师单向度的知识传输方式，引导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探究创新能力等。

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数据，复旦大学开设的所有混合教学课程都有学分。到了2015/2016第一学期，学校已开设16门混合教学课程，选课人数达2537人。

据陆昉介绍，目前这16门课大部分都为必修课。而从混合教学的比例分配来看，像思修课基本1/4的课时用于讨论课，另外还有两次直播互动，其余时间由学生自主学习。而对于一些理科课程，讨论课的课时大概要占二分之一左右，这样老师和学生有足够时间交流互动，答疑解惑。

“尽管学生大约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线学习，但学习内容比原来课堂上学的不会相差太大，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节奏开展学习，学习效率可以说得到很大提升。”陆昉认为，复旦的混合式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另据了解，自2015级新生开始，复旦学生在入学报到前，可在复旦大学计算机能力水平测试FCT网上学习平台上自主学习，报到后参加FCT考试，通过后即可免修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据了解，复旦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在线课程体系，根据学生人群的不同定位，可分为面向复旦学生的混合教

学课程，面向高校学生分享优质课程以及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慕课课程。

### 在线课程以通识课程为主

据北京印刷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姜东升介绍，学校四五年前就开始尝试开设在线课程，主要是针对一些通识选修课，例如公共关系学、人际交往与沟通、自我探索与成长等。学生可以在线选修这些课程，成绩通过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据介绍，每个学生大概需要上4门左右的在线课程，一般一门在线课程是两个学分。由于服务器网速的问题，目前印刷学院的在线选修课程每次只能承接100名学生预约选修，“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了限定人数，学生只能靠抽签决定。”

姜东升说，在线课程的设置丰富了学校选修课体系，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性。由于目前开设的在线课程主要以通识课程为主，没有太深奥的专业知识内容，开设目的是为了开拓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素养，所以对于学生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无论是真正去学习还是通过做题掌握知识，完全靠学生本人自己决定。

而针对专业课程，目前学校的做法是，正在录制一些微课，“把一节课的

知识点录成若干个微课，挂在网上供学生课后参考。”姜东升说，这种微课程不涉及学分，只是正常课堂的一个补充。

针对一些学校出现学生网上刷课的现象，姜东升认为，学生总是有好、中、差之分，大家都想获得学分，难免会出现个别学生投机取巧的行为。“任何一个技术都会存在弊端，我们只是关注大多数学生能从这项技术中获益，至于个别通过作弊手段获益的学生，也做不到完全杜绝。学校的目标就是把课程开设得更合理，让学生更有兴趣去选修。”

### 在线课程受认可质量是关键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目前整个慕课的发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可能注册学习的人多，学完的人少；二是有不少人学习的目的就是混学分，存在功利导向。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会使慕课产生很多水分和泡沫。

此外，如果慕课对教学质量监控不严的话，学生可以轻轻松松刷课，拿到学分，但是学分质量得不到认可，慕课就走向了反面。多年前我们的远程网络学历教育就存在这个问题，很多人轻松拿到了学位，但这些学位并不被社会所认可。所以，对于在线课程纳入学分机制，不能为纳入而纳入，关键是保证课

程质量。对于高校来讲，要有一个全面的课程体系构建，对于在线课程和传统课程都要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对于在线课程的发展，高校也不应急功近利，盲目追求开设了多少门在线课程，要搞清楚在线教育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不要形式大于内容。

### 线上课程也要保证学生权益

胡卓玮 首师大教务处副处长

线上课程是一种潮流，可以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但要从制度上保证学生的权益，不能因此影响学生的学习。另外，现在线上资源非常多，学校要对这些资源有一个甄别。

同时要考虑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比如一些在线课程出现刷课的现象，这也是学校担心的问题之一。这涉及学习质量和管理，课程质量谁来保证？谁去监督？都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 教师学生都需转变教学观念

陆昉 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主任、复旦大学原副校长

要不断扩大混合式教学课程的规模，会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学校要有相应的规划、政策和措施，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因为发展混合式教学课程，教师要有大量投入，花费的精力还是很大的。

二是教师要改变传统以教为主的观念，而要考虑怎样利用混合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怎样提高教学效率，以改变传统课堂效率低下的问题。

三是学生的观念也要改变，要学会主动学习、探究性的学习，要学会独立思考，勇于讨论和交流。

作者：孔悦 杜丁

来源：新京报

## ■ 北大人物

### 仁者百年——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的世纪人生

2013年11月30日。北京，金台饭店。“中国围产医学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严仁英教授百岁寿辰庆典”正在这里举行。

初冬的暖阳和煦温婉，把人们的心也照得暖暖的。

人们追述着严仁英的故事，像是在回顾一部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史和一位自强不息新中国女性的奋斗史，人们在分享着一个世纪的感触和喜悦。

主席台背板上，一幅巨照吸引着全场人的目光：鹤发童颜的严仁英欣喜凝视着怀中的婴儿，仿如观音送子，写尽无限慈爱。平凡的礼堂似洒满圣洁之光。

她的慈爱来自内心深处。

大爱：始于闺秀 源于杏林

让我们走进这位世纪老人的百年记忆。

1913年11月26日，中国北方早已迎来了冬天的严寒。天津城西北角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里，严氏女学的学生们正在一片新式“西学”教育环境笼罩下，认真倾听老师授课。

伴随着严寒和严氏女学的朗朗读书声，严氏家族深深宅院里传来婴儿的啼哭，严家孙辈第18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女婴的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于是，按照严家孙辈“仁”字排序，祖父严修为她取名“仁英”。

说起严修，无不知晓，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

严修送给严仁英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一生致力的新式教育。正是这新式教育，培养了她独立自强的性格和宽容待人的品德。这些习惯和心态，令她受益终身。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严仁英考入了中西女中这个教会学校，两年后，转至南开女中。临近毕业，严仁英立下学医之志。“家里没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给家里人看病……”谁能想到小姑娘当年这个单纯的愿望，却在自己的心田播下一颗博爱的种子，直至枝桠参天。

1932年，严仁英怀着求学从医之志，迈入清华园，成为生物系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清华园的3年，对严仁英来说就是6年，生物系的老师知道她想学医，就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严仁英愉快地担起了这个“双肩挑”。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协和医预科，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奔波在两个学校之间，然而她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各科成绩出类拔萃的她还是校篮球队主力，校合唱团和话剧团的演出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

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前3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考上了美国人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立志从医的愿望实现了！她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

严仁英喜欢孩子，特别喜欢，在农村的时候流着两条鼻涕，脸上挺脏的孩子她也要接过来抱一抱。

严仁英心中的偶像是恩师林巧稚。

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严仁英有空就去产房感受“甜蜜”。

产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老师一来就都没声音了。只见她坐在产妇身边，摸摸肚子，听听胎心，产房里马上安静下来。真神奇！

那一刻，她感受到，老师的爱心就像涓涓细流，安抚着每一个产妇……

严仁英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万婴之母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巧稚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主任。重新开业的北大医院（自此得名）由于教授们大多为兼职，所以把自己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招来担任病房的住院总医师。林巧稚自然找来了严仁英。

33岁的严仁英成了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繁忙的工作中，她经历了事业提高和发展的喜悦，也体会着妇产科事业的艰辛。

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用门板抬来的产妇。一天，有4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产妇走几十里路赶到医院，其中一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哀求：“大夫，您救救娃他娘吧，肚里的孩子死活都无所谓，家里还有俩呢，我们家不能离开她！”严仁英定睛一看，那产妇可能临产好几天了，已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已经死了，便只能做毁胎术，产妇合并感染和

贫血等诸多问题，也是奄奄一息，抢救起来相当困难。

产妇的生命终于被严仁英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可是无论是险些丧命的产妇，还是死去的婴儿，还有产妇丈夫的哀求，都像一块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严仁英的心头。

之后，她又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送来的产妇有的胎儿胳膊或小腿已经掉出来，满地血淋淋一片甚是凄惨。在为母子生命感叹的同时，严仁英更体会到她心目中“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那“甜蜜事业”内涵的苦涩和无奈。

大师：围产保健 开创先河

1964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这时，她才真正了解到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状况。在农村生孩子是死人关，一把土剪子就把脐带剪断了，有点知识的用火烧烧，然后破布条子撕一块衣服裹上……破伤风很多，产妇死亡率特别高。这不仅启发了她要为改善农村妇女儿童健康作贡献的意念，还使她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临床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群人。

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她认为做好围产保健工作，保护母子平安，意义十分重要。她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花甲之年毅然改行，扛起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旗。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对计划外妊娠的终止方法全靠人工手术流产。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存在一定危险性，有的地方使用土法子，扎坏了膀胱，出血、感染甚至死人。

严仁英在科里建立计划生育实验室，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创出抗早孕非手术治疗终止妊娠的路子，最终造福了广大妇女。严仁英正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

以往，产前检查初诊要等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要从妊娠初开始。于是，她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这是全国最早的早孕门诊。而配合早孕门诊开办的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着优质服务。如今，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早已被人们熟知。

严仁英从80年代末开始探讨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高危医学与社会学因素，倡导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孕妇实行分级管理与高危转诊制度。

90年代初,她关注孕产妇心理保健,提出待产过程中的陪产与心理疏导,促使开展导乐服务降低剖宫产率。她带领研究人员翻译了《妇产科身心学》并开展有关影响更年期症状发生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研究以及产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开拓了妇产科临床与妇女保健服务相结合的新思路。

80年代初,严仁英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围产保健高危因素调研,发现神经管畸形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究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叶酸有关。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

这一研究成果,1996年被卫生部推广。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50%。这是严仁英为妇幼保健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为此她获得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研究成果,调整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那时,严仁英有3大心愿:第一,建起妇儿大楼;第二,成立全国围产医

学会;第三,创办促成全国围产医学发展的专业杂志。1988年4月24日,在严仁英领导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儿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1998年5月,《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问世,严仁英任总编辑。2000年,该刊物被审定为核心期刊。

严仁英用自己的手推开了一扇门——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有效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严仁英为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她迈出诊室的一小步,却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一片天!

大德: 坦荡宽容 使命神圣

1949年,严仁英从美国学习回来后,第一件工作竟然是给妓女检查身体。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所有妓院,并严令要求所有妓女必须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同事们想到严仁英刚刚留洋归来,这个工作对她来说似乎有点“不上档次”,以为她不会参加。没想到,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去。”

在她眼里，患者就是患者，没有什么身份的差别。

在妓女教养院 4 个月的医疗工作，她用真诚热情感动了这一特殊群体。

严仁英不仅是医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工作十分繁忙。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二次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工作。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现在国际场合，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

严仁英这种豁达、平和的心态，也帮她顺利地走过了人生低谷。

文革期间。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卷入一场劫难，她的一切工作不得不停止。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身为刘少奇的嫂子，一夜之间，严仁英头上便扣来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刘少奇插到北大医院的黑手”，年逾半百的“严主任”被贬为卫生员。当时即便是在医院做清洁卫生，严仁英也是一丝不苟。同事回忆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厕所最干净了”。

一天，一个分娩时胎儿个头太大被医生告知必须剖宫产的产妇家属，不同意“挨一刀”，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的医生赶忙找到正在刷厕所的“严大夫”。严仁英用手横着竖着比划了一阵，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

接产医生按照严仁英说的做，结果母女平安。

遇到必须“剖”而家属死活不乐意的情况，严仁英就苦口婆心地劝。渐渐地，上厕所找严仁英的人多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妇产科专家。至于科里的医生，更是经常找严仁英，因为很多问题要请教。

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宽容大度的心，严仁英以微笑和坦荡度过了艰难岁月。而恢复工作特别是当选北大医院院长的她，仍然以一个仁者的宽容之心，与那些曾以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和迫害的人和睦相处，既往不咎，令每一个北大成人由衷敬佩。

严仁英当了 25 年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到第八届），8 年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和第三届）。25 年中做了多少有分量的议案提案，她记不清了，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在乡下工作中，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国外讲学时，她看到当地中小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轻松的学习环境，相比之下，国内中小学生的书包则越来越重、近视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提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她带头发出捐献眼角膜和其他各个器官

的倡议以及关于提倡试行安乐死和制定母婴保健法的议案。

严仁英 1951 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她一直把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作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视九三学社为心中的精神家园。

1951 年 3 月，严仁英跟随卫生部第一任女部长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次年 3 月，她随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细菌战调查团二次赴朝，冒着随时被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收集了大量罪证。

此后 4 年多的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用流利的英语和详实的资料代表中国科学家向参观者控诉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译成中、英、法、俄 4 国文字出版。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医学教育家。从她的课堂里走出一代又一代北医学子，这些亲历严仁英教诲的学生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遍布中华大地。

1991 年，在严仁英积极倡导与奔走努力下，北京医科大学在公共卫生院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先后招生 8 届 142

人。在此间严仁英捐资设立了“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和吸引更多学生投身妇幼保健事业。

1992 年，严仁英带领多学科专家，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旗帜下，创建专家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主要研究与儿童和青少年有关的课题。她亲自参加了调查老少边穷地区的现实情况并提出可行建议。在严仁英率领和感召下，专家委员会的队伍不断扩大，她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都成了专家，为我国儿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严仁英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

王光超是严仁英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一次急诊经历成就了他俩恒久爱情的开端。一个得白喉的小孩来了，嗓子全被糊住，憋得全身发紫。王光超见状立刻打开消毒包取出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孩子的气管，插上了管子。孩子得救了。当时严仁英就想，这个人一定是个好大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仁英和王光超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自己的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1949年10月，他们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双双回国工作。

严仁英和王光超晚年生活十分俭朴，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她们却怀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为医务人员捐出2万多元购买设备。

直到95岁高龄，严仁英仍每周到医院上两个半天的班。上班后，她通常看看文件，为医生看看文章或和医生们一起讨论一下妇幼保健方面的课题、活动等。她常常健步走进病房，微笑站在床前。双眸凝视患者，双手抚爱孕妇。“昨天晚上睡的一定好吧！瞧，今天脸色红润多了”。“咱们一块下地走一走，那样孩子会好生一些”。顷刻间，一股暖流像阳光撒满了冬日的屋顶。在医院走廊里，严仁英也不忘和小患者亲切地打招呼。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婴

儿室。严仁英笔直的腰板和清晰的头脑，让周围的同事们感到：“在严大夫面前，我们不敢说老。”

岁月如歌。

从立志行医的协和高材生，到第一个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在祖国医学道路上已经走过了60余载。在绵延了一个甲子的沧桑人生和命运变化中，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她的光明照亮了多少人的生命道路，她的炽热温暖了多少母亲、儿童和家庭。

一百年的岁月长河静静地流淌。这是爱心百年，教育百年，科技百年，更是奉献百年。

来源：九三学社网站

作者：戴红

## 黄晓军：大医生之路

【前言】十几年来，人民医院教授、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建立、发展、完善、形成了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恶性疾病”的新型体系——“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

植”。这个方案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成为国际上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主流方案，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获2016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之首。不仅是在中国，在意大利、韩国

等几十家海外中心都在应用“北京方案”，全球超过 50%单倍型移植病例使用这一技术。

黄晓军领导下的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倍型移植中心。到 2016 年，黄晓军团队完成了超过 3200 个病例。单倍型移植的三年无病生存率为 68-89%，疗效等同于配型全合的移植。



黄晓军近照

### 主动学习，涨知识，炼逻辑

早七点十分，人民医院清河院区，黄晓军开始查房，身后是十四个医生。

一出病房，黄晓军就开始“挑战”病人的主治医生们。

“为什么使用地米而不选择强的松？地米和强的松的区别是什么？这个知识层面的东西你要首先搞清楚。”

“体温高的原因是什么？第一要查体温曲线，第二排除感染，第三再考虑免疫性，做好诊断。目标清楚你再考虑你的办法，用药。”

“临床是解决问题之道。首先要目标明确，实现目标的方法有很多，不要把方法当目标，不要为了用药而用药。”

“细节决定成败，为什么还要打干扰素？打多长时间？一周两次还是三次？”

查房中，黄晓军无时无刻不在向他的医生们传递成长晋级的“秘诀”和“理念”。

黄晓军习惯走楼梯，从十一层到八层，进出二十多间病房，查看三十六位病人的情况。八点三十，到达五层会议室开始大查房会议，这时查房的队伍已经扩充到三十四人。

每一个汇报的医生都战战兢兢：病人的病史，体温变化，有无皮疹、腹泻，用药情况……一一说明。但这常常遭到黄晓军的批评，原因是“逻辑性太差”。

“汇报病例要进行系统归纳，不要只是罗列症状和用药，要形成诊断。”黄晓军对医生们强调再强调。



黄晓军带领医生们查房

在黄晓军看来，“诊断”是临床大夫们首要解决的逻辑关系。但恶性血液病大多病情复杂、变化快，一个症状出来，医生往往难以立刻做出正确诊断。

“西医是诊断导向型。是什么疾病导致的？病理生理基础是什么？所有一切都要以诊断为中心。如何做诊断鉴别？第一是知识和逻辑，临床上有很多指南。第二靠动态分析，根据病情变化不断评估、检讨、修正之前的诊断。第三靠经验，经验性治疗也是诊断鉴别的一部分。”黄晓军对记者说，“经验就是让你去猜，你觉得它是什么？然后再用逻辑去证实或证伪。”

“好的大夫就是要能做出预判。当病人情况有好转时，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机；当病人看似垂危之时，也不要灰心，能找出一线生机。”黄晓军说。

黄晓军骨子里是个“理科男”，喜欢理性，重视逻辑，强调训练。他把每一次出诊、查房、看书、写作、演讲都

看做一次逻辑能力的训练过程。“我喜欢写综述，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提炼的过程；去作报告，只有三十分钟，必须把一件事说清楚，要讲什么不讲什么这也是训练归纳能力的过程。一百句话归纳成五句话，很不错；归纳成一句话，水平更高！你永远要去不断进步，这就是百炼成钢。”



查房会议

大查房会议往往要持续两个小时的时间，十五个病例一一讨论下来。黄晓军继续不断给他的医生们“挑毛病”。他给医生们提问，挑战和质疑他们的每一个判断。他说：“我给你们提问，答案是什么不重要，解决问题的思路最重要。”

黄晓军要求医生们，每次查完房都应该回去“翻书”，“知识性的东西翻教科书，研究型的东西翻文献。”

主动学习是黄晓军身上的一大特征。在中山医科大学读本科时，黄晓军就善于把书本读“薄”。他喜欢自己看

书、归纳，而不是简单听老师讲解。1987年，黄晓军考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研究生。一入学他就自己主动去写综述。进入临床工作后，遇到病人出现发烧症状，找不出原因，黄晓军就去翻书、去学习，想方设法把原因找到。

“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现在知识太多了，你需要挑选、聚焦，这就更加需要主动学习。”黄晓军说。

在黄晓军看来，青年医生首先要成为知识丰富、逻辑能力强的“匠人”，能用现有的医学知识、人文精神帮助病人解决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向解决未知问题的“医学家”迈步。

### 挑战禁区，艰难起步

2016年2月18日，“美国骨髓移植会议(ASBMT)”在夏威夷檀香山开幕。这是国际血液研究领域中的顶级学术会议，在黄晓军之前，还从来没有中国人登上过这个会议的演讲台。这次，他应邀介绍了团队的研究项目“不去T细胞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优化选择体系”。这一移植方案，从2015年开始，被国际医学界称之为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

骨髓移植，也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手

段。按照传统理论，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一致。但这种相合的几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1/2，兄弟姐妹之间只有1/4。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供者来源就更加稀少。

要解决供者来源问题，最好方案就是单倍型。

所谓单倍型移植，简单说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况下进行移植。因而患者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成为供者。但单倍型移植后，排斥率高达70%-90%，抗宿主病发生率高，患者生存率只有HLA相合移植的三分之一。因此，单倍型虽是研究的热点，但也同样是研究的雷区。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白血病专家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这样就不会出现抗宿主的问题，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感染排斥复发升高。

黄晓军也重复了意大利的技术方案，但没有获得很好的疗效。

“我们当时都是跟着老外走，但老外的方法不灵，我感觉大家对单倍型都没有什么信心了。”当时黄晓军三十七岁，事业刚刚开始。“当时我跟几个朋

友吃饭开玩笑说，咱们又得上山打游击了。”

1978年，美国科学家托马斯正式提出骨髓移植根治白血病的方法，而今却因找不到供者不得不退回化疗的道路，这不是技术落后吗？初生牛犊不怕虎，黄晓军觉得必须得把单倍型搞定。

“搞不定我们就没饭吃了。”就在这样一个简单想法的驱动下，黄晓军决定另起炉灶——“用中国的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黄晓军回忆当年那股闯劲说：“创新更多的是一个需求、一股勇气、一种力量，是一个打破旧规则、动了别人奶酪的一个过程。”

黄晓军“中国的思路”是——“我们能不能把T细胞的功能暂时管控起来，让它在早期不产生抗宿主病。等过一段时间它们适应了，我们再把T细胞功能放出来，然后让它慢慢去抗肿瘤、抗感染。所以我们锁定了G-CSF。”

G-CSF是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最早被用作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外周血内含有的T细胞数量是骨髓中的十几倍，但移植后发生抗宿主病的几率却并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有人推想，G-CSF使得T细胞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1996年，黄晓军开始带研究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着学生们做起了体外实验，对G-CSF的机制进行系统的免疫耐受研究。

此时的黄晓军名气不大，经费不足，只有一个想法和一些初步的研究，他申请的项目，都没能获得批准。

2001年前后，黄晓军从北大医学部申请到八万元创新基金。“当时柯杨副主任听完我的汇报后，把我叫一边问，你这个东西有基础吗？我说，有。她说，那行，你试试吧。”

这个项目的成功申请给了黄晓军极大信心。“成长过程需要台阶，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台阶。”

日后，在此基础上，黄晓军申请国家“86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手握科研经费何止千万，但这最初的8万经费，如同种子，落地生根。

### 敢于担当，感恩病人



黄晓军为病人诊断

2001年，黄晓军遇到了第一例实现“北京方案”的病人。

X先生是一个做完自体移植后复发的病人，各种药物对他都无效。黄晓军对他说：“我们尽力使用药物治疗，但疗效不乐观。如果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异体移植。”

但X先生是独生子，没办法找到HLA全相合的异体供体。因为有体外试验的基础，黄晓军认为，用G-CSF来诱导免疫耐受，进行单倍型移植或许能成。

X先生非常积极。“他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父亲给他提供造血干细胞。”

但这时，黄晓军开始犹豫了。“我还真不一定敢做，对于G-CSF的机制我们还不是太清楚，可能有用，但也不一定。”黄晓军非常坦诚地告诉病人他的顾虑。

“黄大夫，我这个病从一开始就是你给我治疗的，我已经活了两年多了，这次复发，如果不做我也就没机会了。即便做不好，我觉得你也积累了经验，所以你就大胆地去做吧！”X先生同样坦诚地对黄晓军说。

就在这样彼此真诚的沟通下，在患者的鼓励下，黄晓军决定跟病人一起承担风险。

很幸运，他成功了。

这给了黄晓军很大的震撼。“因为病人对生命的渴望、对我的信任，才使得我有勇气能够跨出这一步。如果没有这些，我可能永远停留在体外，我可能永远停留在动物实验，甚至有可能永远停留在想象之中。”黄晓军说。

现在，黄晓军常常鼓励他的医生们要有担当。他视“风险”为“挑战和机遇”，他说：“一个医生如果不敢面对风险，他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大部分人被风险压下去了，只有顶着风险的人才能冒出来。”

但黄晓军说的要有担当，也不是什么都担当。他常说，医患是一种互动游戏，医患沟通非常重要。

门诊中，有病人纠结是用骨髓库里的全相合还是用家人的半相合，黄晓军会首先问病人的倾向性。需要病人做决定的事情，医生不能代劳。

查房时，病人顾虑一种进口药物的使用风险。黄晓军说：“医疗过程就是冒险，你怕，我们比你还怕。”

“医生不是神。”黄晓军常说，“医生治得了病，救不了命。”他非常清楚医生的职责：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因而，他也就更强调医患沟通、取得病人信任的重要性。

他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他为抢救一个病人三天三夜没睡，可病人还是过世了。当他向病人家属提出进行尸检的希望时，病人家属对他说：“黄大夫，要是别人提这个要求，我肯定不会同意的。但是你对我女儿特别好，你要做尸检我同意，只是我有个要求，你今晚就做，做完明天早上缝好，别让她妈妈发现了，否则我就做不了主了。”

这几句话让黄晓军非常感动，这让他知道，医生的付出，患者和家属都看在眼里；这更让他明白，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是开展医疗活动的基石。

黄晓军很少对病人笑，查房时简单一句，感觉怎么样？看门诊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只是见到小患者会夸上一句，真可爱，或者问，怎么又哭鼻子了？

他不是那种“和蔼可亲型”的大夫，但他是那种把病人装在心里，时刻想着给病人解决问题的大夫。现在，即便已经是名震世界的大专家、领导两百多人的研究所所长，黄晓军每天最放不下的依然是这些病人。

他保持着一周三次门诊的节奏。周一到周五，只要他在北京，你每天都能在病房看到他。甚至，周一在深圳出差，周三在香港还有会议，但黄晓军周二还

要回一趟北京，因为这里有病人他要回来看一眼，还有门诊，他不想耽误。

门诊上，有病人病情恶化，急需住院，没有床位，黄晓军会先让病人离开诊室，接着立刻电话联系落实，十分钟后，病人家属敲门，含着泪说感谢。

对于病情复杂的住院病人，黄晓军要求医生们每天向他汇报情况。车上、会议间隙，他挤出所有能挤的时间，分析判断二十多个病人的病情走向，指导医生注意事项。

黄晓军对病人，看到的不仅是“病”，而是患了“病”的人。门诊上，一位父亲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复查，他会挤出时间来叮嘱他们尽量想办法让孩子回归学校。

“病人感谢我，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但实际上我内心想说的是，我应该感谢的是病人！因为他们用生命让我完成了我的创新之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黄晓军这样说。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北京方案”输出世界**



2014年黄晓军教授在欧洲骨髓移植年会作大会报告

2001年，黄晓军的第一例“不去T细胞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康复出院。

黄晓军很欣喜，也很谨慎，小心翼翼。“这就有希望了，慢慢地，我们做第二例，也是复发的患者。”这一年，黄晓军完成了五例单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并不代表你就成功了，一个好的临床方案需要持续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黄晓军说。

2004年，案例数达到一百例时，黄晓军在一个小型内部会议上通报了他的结果。

但黄晓军的数据，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同。他们在私下说：“你还真相信黄大夫那个结果吗？我们都做了这么多，怎么就不行呢？”

受到质疑和挑战，当时的黄晓军觉得自己很“冤”，但经历之后，黄晓军

体会到：“科学讲究重复性，创新必然经历非议。新的东西本来就不完善，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越能帮助你尽快成长。”

事实和数据能够说明一切。黄晓军团队的成功案例数，继续上升。

2007年，黄晓军正式向媒体报告好消息：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来源难题破解，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体系”，从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复发等诸多环节有效解决了难题。

此时，国内的跟随者也越来越多。下一步，黄晓军要带着他的方案，征服世界。

从2009年开始，黄晓军应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邀请去作报告。在当时，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干细胞移植中心，水平最高、知名专家最多。

2009年黄晓军去时，这里专家对他的态度是：既有怀疑、不相信，但又觉得奇怪，还想听听。他们私下的评论是：“中国人的结果你也信？”甚至一次会议上，一位美国专家“引经据典”表达他对结果的不信任，“恨不得就直接说你的东西作假”。

尽管英语不算“灵光”，黄晓军却并不畏惧，他认为，这就是中国人发出

声音的机会！除了争取“说”的机会，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他坚持自己的方案可行，并不断地完善它。

“团队也会有人说，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可是老外都没做，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呀？我说你这是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必须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要相信红旗一直能打下去，怎么能自毁长城呢？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好的，他们一定有弱点没有给你展示。”黄晓军从来不相信“国外的月亮会更圆”。

常英军是黄晓军的博士生。2016年，国际临床肿瘤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简称 JCO, IF=18.4) 在线发表了“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基于危险分层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前瞻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成果，常英军和许兰平为共同第一作者。

这一研究利用细胞标记预警预测，筛选高危患者进行“精准预防”，使高危组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大幅降低，极大地提高了移植安全性，为“精准医学”走入临床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式。

这个研究历时三年，共纳入 228 例患者，根据移植前分子标记分为“高危”“低危”两组，高危组进一步随机分为预防组和对照组。研究发现，小剂量激素降低了 GVHD 的发生率。

“我们在写文章时，有国外专家建议我们去掉‘低危’组别，并认为我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一个级别较低的期刊上。但黄大夫认为去掉‘低危’组别，就失去了‘危险分层指导’的意义。黄大夫就坚持了我们最初的理念，最终我们的文章也在 JCO 上发表。”常英军佩服黄晓军的“坚定不移”。

在黄晓军的坚持和团队的努力下，研究成果接踵而来：

他们证明了 G-CSF 和抗胸腺球蛋白诱导免疫耐受、外周血和骨髓移植物混合应用是移植成功的关键，初步阐明上述因素通过调节性 T 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发挥作用；

单中心研究证实单倍型移植治疗急性白血病总生存率优于单纯化疗及脐血移植，达到了与非血缘供者移植等同的疗效；

他们建立了基于 G-CSF 诱导免疫耐受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及白血病的其他原创性预处理方案；

他们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可安全用于单倍型移植后白血病复发的防治；

他们提出被国际认可的单倍型供者优化选择原则：即首选年轻、男性、非遗传母系抗原不合供者，证实基于白血

胞抗原相合程度的传统选择理论不适于单倍型移植；

他们建立了国际原创、以分层乃至个体化治疗为特色的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体系。

这些成果发表于骨髓移植最高水平的BBMT和BMT以及血液学最高水平期刊Blood等杂志上。其中“供者优化选择原则”于2014年以封面焦点论文形式发表在Blood上。

数据显示，北大人民医院血液所接受单倍型移植治疗的标危白血病患者的三年无病生存率达到68-74%，高危白血病为49%，优于同期M. D Anderson、Johns Hopkins等国际著名移植中心。

黄晓军团队的成果推广至全国绝大多数移植中心作为临床常规应用，推动了我国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整体水平的提高。

事实胜于雄辩，随着黄晓军方案的不断完善，成功案例的不断增多，可复制性的不断增强，国际“大佬”们逐渐改变了他们的“刻板成见”。

去T单倍型相合移植的免疫学理论奠基人——以色列学者Yair Reisner教授也指出：“北京的黄晓军等建立的单倍型相合移植方案降低了死亡率、提高的长期生存率。”

2013年，意大利团队重复出了黄晓军团队的结果。意大利学者Velardi教授评价认为“取得了很好疗效”。

黄晓军的这一方案也被写进了国际权威教科书，并在意大利、以色列、法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海外中心得到推广。

2015年，国际会议上明确以“Beijing Protocol”即“北京方案”来命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建立的单倍型相合移植体系。

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协会(WBMT)主席Kodera推荐“北京方案”作为缺乏相合供者的可靠方案。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Blazer教授在Blood评论：“（北京方案）基本解决了供者来源缺乏的世界性难题，单倍型移植将迎来快速发展。”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工作让全世界的血液的老大们已经接受了单倍型是可行的。”黄晓军说，“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会感悟到很多东西，也会因此变得更为强大。”

**“带不出团队，就是我所长的失职”**



黄晓军和血研所的科研团队

2016年，以黄晓军为学术带头人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应用基础研究”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这是目前我国学术影响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创新人才类项目。

2005年，黄晓军接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黄所”，现在是很多人对他的称呼。

黄晓军常说：“考核我作为所长干得好不好，不是看我个人成绩是否突出，而要看我是否带出了一个人才团队。”

“刘开彦教授非常有全局观，能hold住，国际影响力很高。我们的张晓辉教授，兢兢业业，抓临床、带队伍，很有影响力。我们的许兰平、江倩、江浩、路瑾，在他们的领域里都是国内非常棒的专家。我们的王昱非常聪明，是后起之秀。我们的常英军大夫，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能力非常强。还有赵翔宇、孔圆也是大夫出身，他们转化研究的能

力也在非常快速地发展。”说起团队成员，黄晓军如数家珍。

黄晓军评价自己的团队：一有理想，二很团结。这体现在每一个成员工作起来都很“拼”。“我们的临床任务非常重，很多人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周六日还会经常过来。当然我也老说他们，不能老这样，老这样你们家里人不得提意见要吵架。”黄晓军说这话时，透着一股骄傲。

血研所的人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下乡支边，临床工作相应轻松些，他们就紧着时间看文献、写文章。飞机上，“黄所”都不浪费一分一秒地读文献了，你好意思看电影吗？黄大夫数十年如一日，一大早到病房，每天忙得就吃一顿饭，其他人也就如张晓辉所说：“大冬天，我们起早贪黑，基本就没见过太阳。”

“外面人会觉得我们很crazy，他们说，黄大夫真有本事，你们怎么就真的心甘情愿天天这么干活。”王昱笑称。

赵翔宇说：“我觉得我要是不好好干活，都对不起黄大夫发我的钱。”

不仅是钱，黄晓军的身体力行，他对团队成员的付出，让每个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教给我们那么多东西，让我们在同行中出类拔萃，那我得还啊，

我得报恩啊！就这么种感觉，时间长了，就真的内化成自觉的行为了。”王昱说。

黄晓军很严厉，他自认“性格强势”，关起门来“训”医生毫不留情。但在外面，所有他能为团队成员争取的利益，他一个也不放过。

有国内外会议发言，黄晓军尽量争取让中青年“抛头露面”；患者感谢他，他首先说的是“团队足够用心”。

黄晓军管理团队，很擅长“让团队成员们各尽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独立的、感兴趣的方向。”常英军说。

“他能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对于你的短板，他也会替你想办法去挖掘，实在挖掘不出来就规避，临床和科研上都是如此。”王昱说。

2013年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院区正式投入使用，王昱担任病区移植部临床常规工作主要负责人。事实上，在一年前，黄晓军就开始“谋篇布局”，派王昱到航天中心医院尝试管理。

“她展现了非常强的知识能力、逻辑能力，管理能力也有提高。”黄晓军如此评价王昱。

在团队核心成员的小组会上，黄晓军鼓励他们：“既然把你们放在重要岗位上，就要勇于承担责任。要不断给自己塑形，形成自己的特色。一群努力的、优秀的人聚在一起，同舟共济，才会形成一个团队伟大的力量。”

“我们以解决病人的问题为导向，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弱势在于丰富度还不够，基础研究虽有进步，但还是偏弱。我们还需要把年轻人再往前推一推，有更多的领军型人才。”黄晓军说。

黄晓军有理想，但这个“理想”他从不细说。在他看来：“理想是一种模糊的精神力量。”在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因为有理想，所以我们从上医学院开始，我们就希望给病人解决问题；因为有理想，我们渴望解决全球未曾解决的医学难题；因为有理想，我们发展创建形成了一个有理想的团队，使得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无所畏惧，永怀信心！”（文/北医报记者 徐璐）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学者谈读书

### 陈寅恪的读书方法——不动笔墨不读书

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

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此外，他还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记》中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等，都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 读“老书”、读“原典”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

佑先生。夏对陈讲：“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无书可读”，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对此，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 圈圈点点——不动笔墨不读书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梁慧皎的《高僧传》是陈寅恪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在《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中说：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

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

蒋天枢也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 不惟书，敢怀疑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

陈寅恪 10 岁时，在南昌曾听祖父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非真人参，乃芥尼也。盖芥尼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陈寅恪侍侧听罢，对《本草》一书和这段故事暗记在心。后来陈寅恪找到《本草》翻阅，“即检芥尼一药，果于先祖

之言符”。“果于……言符”，充分表现了陈寅恪的求真与求知。正是不惟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 只求学问，不受学位

陈寅恪从 12 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 18 年。让人深思的是，陈寅恪虽然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陈寅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

1925 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

一代学界泰斗，却没有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特立独行之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

恪读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编辑：丁香的耳朵

来源：微信号 雅理读书

## 陈平原：“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

又到了照毕业像的时候，校园里到处绽放着笑脸与鲜花，空气中荡漾着歌声笑声祝福声，博士袍硕士袍随风起舞，无论生人熟人，全都把善意写在脸上。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刻了。如此盛大的节日，基本上属于应届毕业生；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导师们，如今只是充当配角或照相时的道具。按理说，教授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如此风光，人人有份，可偏偏我就没有这样温馨的记忆。

1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手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

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

也不是我特立独行，那时北大压根儿就没有此类穿袍戴帽拨丝带的仪式。前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正面教育，后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反面文章，对于各种华丽表演，学者们大都没有好感，以为真实且深刻的个人感受，不必借助仪式，也能永远铭刻在心。只是随着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渐西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纱照、酒吧街、生日派对、博士典礼等方才大行其时。到了这个时候，像我这样既没拍过婚纱照，也没戴过博士帽的，一下就显得很土。

话说回来，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学位，也不无好处。对于国家来说，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乃学术独立的标志，是天大的喜事；至于个人，读书做学问须持之以恒，“博士”云云，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念及此，我

辈对于博士帽的过分简慢，也不算太离谱。只是每回清点“过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张冠冕堂皇的博士照，还是感觉有点遗憾。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粉墨登场，补拍一张，还没想好。

我之所以不是特别看重这博士头衔，其实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学博士，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博士。

说起来，我之“读博”，纯属因缘凑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学业，希望到北京工作。由于王瑶先生的大力推荐，北大中文系准备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可到了学校这一关，被卡下来，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让他考博？于是，我有幸成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此前，北大中文系诸多名教授，虽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或因本人谦虚（“我都不是博士，让我怎么带博士生”），或因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弟子，一直悬着。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普遍养成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北大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举行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

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士，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术对话，还有就是访问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1989年岁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写《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其中有一段话广为传诵：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

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

制度不太严格，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励，也难得惩罚。如此缺少竞争，是否会降低学术水准，我看不一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自由自在的读书状态，更接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读书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优游从容。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课程太多，不适合于从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来，对于读书人来说，“闲暇”十分重要：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

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不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

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起码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在讲求规则严格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读书”辩护，或许不无必要。即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念叨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

王瑶先生的指导博士生，有几点明显与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来讨论。第一，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理由是：不垒高坝，提不高水位；随处发泄，做不成大学问。这还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时可能揣摩风气，投其所好；或者发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第二，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只负责首肯或否定你的选题。理由是：所有好的学术选题，都内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别人取代不了。更何况，对于学者来说，此举生死攸关，正是研究生教学的重点。第三，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理由是：学位论文必须凸显作者的眼光、训练与表达能力，不能弄成臃肿芜杂的史料长编。你可以有很多附录，但正文部分必须干净利落、严谨简洁。王先生的这一“戒

律”，日后有所松动，但基本思路没变，即学位论文并非“以长为美”。

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给学生出题这一招，在我看来，实含至理。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早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刚博士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

知，儒者之耻”）相混淆。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 Ph.D. 或 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

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

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作者：陈平原

来源：微信号 爱思想网站

## 好文共赏

### “山水”没落与现代中国艺术的困境

山水系统的发育：中国文明的独特 DNA

1854年，梭罗写了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书，《瓦尔登湖》。五年前，他写过一本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对于“公民的不服从义务”这个话题，历来我们都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殊不知，《瓦尔登湖》的写作，即是对五年前这一政治主张的丰富和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呢？《瓦尔登湖》所要表达的，当然不是纯粹政治领域的事情，梭罗所说的公民不服从，并不可以完全理解为一种不服从的政治权利，相反这意味着，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不能僭越的自然的存在。

所以，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讲了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王国的国王，与这个王国相比，沙皇帝国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小国，犹如冰天雪地中的一块小雪团。”他也说过：“天空既在我们的头上，又在我们的脚下”；“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自然会认为无论何

处都可以安身”。梭罗的这种说法，恰恰印证了在整个19世纪中期以来，在马克思所说的物化世界里，以及后来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压抑的世界里，都必须为人们留出一个独立的自然世界。人们可以不完全听命于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摆布，不彻底服从于现实的世界。

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像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讲的悖论，还有亨利·詹姆斯对美国内在文明之灵魂的探寻。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明白，在现代世界里，不能只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构成的总体史，而必须还要有一种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自然王国，而作以平衡和矫正。自然的构成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栖居之所，是一切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神、人、物相分离的状况得以重新弥合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文明，恰恰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古以降的山水系统的发育，构造了独特的文明DNA。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皇权与神权》里面谈到，早期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和后来封建制度解体后的“士大夫”不

一样。封建制解体后，某种皇权专制的系统出现后，很多士大夫把孔孟老庄努力混合成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形态，这使得中国的士人逐步构建出一个自我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纯粹的权力，并单纯以“出仕”作为自己的人格基础和政治理想，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王国。这里的自然王国，并非仅停留在现代世界中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间的纠缠，而造就出士大夫内在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这是文明存续的关键。

费孝通先生说，汉代以后，多出了一种“逃避权力的渊藪”。这时候，周公的形象才真正复兴，从文王、武王到周公，从周公引出孔子，其实所要表达的恰恰是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不能完全融入到政治系统里，而是自我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与之相平衡。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山水“可居可游”，体现的也是孔子的这个意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由此，就分殊出两个相互不同的世界，“邦有道”，我们就该投入现实的世界做出一番大事业；“邦无道”，我们就要进入到山林里面，在山水世界里，构建出能够延续从周公到孔子的真正文化血脉的

一套系统。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这是世世代代都要追溯的传统，宋代李唐南渡，画了一幅《采薇图》，讲伯夷、叔齐的故事，本质而言所强调的是归隐的系统，去跟正统的政治原则做平衡。士人与国家之间有微妙的并立的格局，使得归隐山林，“乘桴浮于海”，成为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情怀。

#### 如何认识“山水社会”？

钱穆先生讲，如果说传统中国有“社会”的话，可以从城市、乡镇、江湖和山野四个系统来理解，这非常类似帕森斯四个子系统的讲法。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是政治的核心，乡镇与城市有别，是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区域，古代很多当官的或者食俸禄者，会在丁忧或者退休的时候，重新返居到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乡居生活里。于是，乡村世界就构成了退隐的想象。《富春山居图》的起点，是《剩山图》这部分，也是从乡园田居开始的。但这个还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我们借此还不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士人精神系统。政治和社会

的关系，不能足以解决完整的士人的理想，我们还需要山林。

在中国，正如范迪安先生讲的，山水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山水不是社会，是社会的反面。山水是出世的，与现世的城市和乡镇相对，也与那种任侠的江湖相对。虽然江湖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但那不是士人的世界。所以，在钱穆先生所说的四个系统中，多重的对张关系，才真正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格局。他也曾说，无论佛教进入到中国，还是道家与儒家的融合，都使得我们反观内心，物己融合，人格透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才是山水的情怀和理想，因为这是现世无法得到的，无法实现的。正因为如此，中古时期佛教进入中国，道教开始复兴，才会有士人这个归隐的群体真正出现。书法上从碑书到帖书，从石刻转为纸幅尺素，仙、释、人物画转为山水、花鸟、壁画，都是这个时代风气的体现。在思想上，我们也开始推展出“尽心知性”、“尽性知天”、“自性自修”等等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也说过：“外服儒生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中国士人双重的品格，内在并未形成真正的冲突。从中古时期以来，特别是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中

的说法，恰恰构成了一种和解，一种“委运任化”的内在修养。陶渊明的诗讲得很清楚：“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中国士人的肇始，是最明确的写照。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根本谈不上中国的艺术，特别是山水艺术。

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他是先唐的宗室，但是在五季艰难的时候，流离于四方，但他气调不凡，磊落有大志，在现世无道的时候，他“放意于诗酒之间，又寓兴于画”，追寻和构建一种完整的士人精神。李成即使落魄如此，也从来没有卖画为生，不像今天，艺术已经沦落到了何种地步。我们看后人对李成的理解里，才知道“山水比德”这四个字的分量。刘道醇讲的很多话，郭若虚讲的很多话，都说明，只有李成这种经历，只有李成这种人格，才能画出“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墨法精微”之意境。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是永远混不出来的境界的。《圣朝名画评》说他“尊师造化，自创景物，结合奇妙”，想必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我想，中国这样一种士人的传统，就像汤垕在《画鉴》里面讲的那样，“凡烟云变灭……莫不曲尽其妙”。这也就是谢赫六法里面讲的“气韵生动”，一种与山

水浑然一体的生命气息。谢赫六法“最后一法”是“传移模写”，说的是要用功读书，要尊古人，取古法。今天的艺术家们，不读书，不敬畏，搞什么艺术创作？

北宋的全景山水，包括南宋的半景山水（当然我们知道马远、夏圭这些画家，他们笔下的半景山水依然是全景山水，因为是用禅宗呈现的全景），以及元代的用心象呈现的山水，这都是士人内心精神的写照，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职业画作。就像王维所说的：“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今天，我们在雾霾里当然看不到自然的造化，但没有心胸，更看不到自然的造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自然与人为一体，自然是人的参照和心象。所以米友仁才会说：“山水心近自得处高也”。人只有站在人心的高处，才能得山水的精神。《广川画跋》说：“盖艺术之变化，有时出则托于画以寄其放，故云烟风雨、雷霆变怪，亦随以至。方其时，忽乎忘四肢形体，则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故能尽其道。”郭熙所说高远、深远、平远，那是对宇宙世界的体会和描绘，高远是无限高的山，是观画中无限高的心理过程。深远是无限的深，广袤天地，千山万水。平远是把自己拉

近到整个世界的居中位置，体会那种势运与无限。

古人讲什么叫胸中沟壑，什么叫胸中气味，什么叫胸中磊落，讲的都是人的境界。倪瓒“逸笔草草”中的“胸中逸气”，今天泯灭的人心里怎会盛得下？把自己挥洒在整个世界里，浸没在整个世界里，山林中的那份自然，是士人全心的构造，是超越性的，是纯粹精神性的。他们永远不会只在现实里去关照，中国人没有了这种内生性的心意心境，我们的文明便早就覆灭了。

### 中国传统与现代性危机的化解

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起源，离不开西学东渐的基本处境。不过，过了一百年回过头看，中国遭遇现代性的时刻，即中西接壤的时刻，恰恰是西方正在经历危机的时刻。以往，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思想的认识，都是从康梁严复来理解，但是我们若追察文化上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初期那些留学西方，或对西方思想社会有敏锐感受力的学者艺术家，就会发现世纪之交的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现代艺术，特别是思想上的接洽，要有谨慎的反思。大家都读过《世纪末维也纳》，这本书全面反映了西方那个时

期的焦灼、迷茫和挣脱。我们若没有对西方文明的传统、历史和现实有全景的了解，没有通盘的把握，便很容易将“世纪末”处境里的心绪、气质、意象拿来，简单附会，刻意模仿。换言之，不读西方的书，不完整地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生成、发育、矛盾和危机，我们就没法理解现代的艺术、当代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当代艺术，都逼近着西方从 19 世纪末开辟出来的风格，从人的整体危机状态入手。我们一接触西方，便是现代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复杂病理，怎能从容应对？

比如说“拼贴”，就是多重生活的逻辑胶着在一起，毕加索用各种材料混搭，真实和幻像、现实与虚妄错综一起，是现代生活样态的写照。再比如，福柯讲的圆形监狱体制，是用庞大的编码系统组建的知识-权力体制，所以，通过解码挣脱常规语言的羁绊，会透出一种创造力，甚至是一种解放感，马格利特画的《烟斗》的符码游戏，大体如此。在后工业时代，无论是艺术的物质性，还是媒介性，都被安迪·沃霍尔拿来反讽式的操弄，波普艺术中的那种无聊感、空虚感，那种单调的重复和疏离，直抵人心的冷漠孤寂。弗洛伊德所探寻的那种无意识的深渊，也像是他的爷爷所揭

示的那种现代世界的病症那样，揭示人们紧张粗鄙的身体，以及文明压抑下的灵魂。当我们用现代理性的筹划预想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时候，杜尚就会给你惊诧，让你脱离这个例行的轨迹而陌生化，在瞬间的疏离、发泄和破坏中，试图去寻得灵魂的解药。所有这些现当代的艺术，是在西方文明几百年的累积和淤积中的一种释放，健康与疾病、压抑与解放都有着极端化的辩证关联，也都有着西方文明自身的基因和变异来驱动。我们从未有过这种完整的历史运动，却总是尾随其后，亦步亦趋。

其实，弗雷泽讲的很清楚，从 19 世纪末开始，西方在经历了由宗教到科学的千年历史后，随着大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又重新返回了巫术。正是在科学与巫术交融并立的阶段，艺术的当下性便径直呈现出来了。巫术是没有历史的，只有宗教才是有历史的。巫术的去历史化，使得这个时代的艺术，只重当下，而对传统进行不断地解构。

艺术家需要经常扮演革命者的形象，扮演批判家的形象，扮演不拘泥于传统，向着人性的各个角落无限开拓的形象。在资本与权力共谋的现代世界里，艺术似乎成为了一种极端个体的解放形态。当下的个体，似乎变成了所有艺术

的载体，中国的艺术家也像小跟班一样，紧随其后，效法其后。这个时代的来临，充分表现为反宗教、反传统、反整全，反对一切既存的历史和现实，希望一瞬间完成革命般的解放。在我看来，当代艺术无非就是当下艺术。当下艺术是片断、荒诞、虚无、即时性和否定性的展现。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就是一个即时性的意念化和陌生化的瞬间，瞬间产生的距离感。这就是瞬间的深度，而瞬间的深度，就是没有什么深度。

瞬间的意念性的深度，对于整个文明来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深度。今天，我们既吸纳了西方的反传统的姿态，同时又把自己的传统反掉。所以，艺术家们不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根深蒂固的当下性所决定的，特别对于中国的当下艺术来说，是双重的反传统的特质决定的。不学习、不摹写、不读书，竟然成为了艺术创造的真谛。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将来一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过，如果反过来说，恰恰也是在今天，却蕴含着重大的创造机会。正因为 we 面临着上述双重的危机，有了切肤之痛，才会努力捡起两项重要的工作：

一是在西方文明的总体框架内反思现代问题，二是将现代性重新“问题化”为传统问题，即从中国传统的资源中寻找化解现代危机的出路。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重复中国的传统，要抱守残缺，而是通过双向的链接而对传统加以新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黄宾虹才是中国的塞尚，他虽与塞尚有天壤之别，却有着相似的文化精神。他的画从来没有那么奇绝，那么怪异，他不断用心、用力、用功，每天在传移模写中重构中国的艺术。在双重的超越上，重新构建完整的山水，重新构建中国人的宇宙观，重新构建中国人整全的超越世界，才是中国艺术的真正出路。艺术的未来，不是跟在资本屁股后面，搞一个小想法，抓住一个小意念，换一种新材料，而是要真正逼近西方和中国的整个传统，对历史和现实有整全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山水，永远是我们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渠敬东

编辑：丁香耳朵

来源：《文化纵横》2017年4月刊

## ■ 史苑钩沉

### 朗润园旧事：少小离家老大回

朗润园安静地坐落在校园的北面，有人说，这个园子连接着庙堂与江湖。新近修葺的仿明清建筑里，林毅夫、张维迎等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者们讨论着中国的经济与未来，静穆严肃又热火朝天。

五十年前，朗润园也是热火朝天的——只是这种热火朝天充斥着嬉笑打闹、锅碗瓢盆的烟火气息。在朗润园这片以 8 到 13 号命名的公寓楼里，一群孩子度过了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童年 桃源中嬉戏，不识愁滋味

拥有一个快乐童年的人总是幸福的，而在朗润园中度过童年则更是幸运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胡坚和她的发小们，就是这样一群幸运的人。他们从小住在朗润园的 8 号至 13 号公寓中，身之所处是舒适公寓，眼之所见是水清木秀，耳之所闻是书声琅琅。从 1963 年搬入朗润园 13 公寓 208 室，直到 1976 年搬离，胡坚在这里度过了十

三年光阴，从幼儿园孩童长成了花季少女。

“当时朗润园的公寓可以说是北大最现代化、最漂亮的，它的设计应用了欧式元素，一开始外墙还是粉红色的，在一片绿树中间非常醒目。”

朗润园 8-13 号公寓临湖而建，住在里面的人打开窗子便能看到粼粼波光，稍远处是小巧的石桥，而极目远望则青山绿树、草木繁茂。

“那时候北大的湖水都来自京西玉泉山水系，水特别多。我们夏天去红湖钓鱼，水中有鱼有虾，冬天就在结冰的湖面上滑冰。”

湖水是发小们的玩伴，园中的花草树木亦是。

8-13 号公寓中住着许多爱花的教授，一到春天，公寓楼下就花团锦簇，而住在距离 13 公寓不远的平房中的西语系教授赵玲克娣，更是有一个单独的花园。那时候发小们有些“怕”她，但都忍不住偷偷趴在她花园的篱笆上，听

着屋里传来的古典音乐，看着美丽的花儿入了迷。

西语系还有一位谭玛丽教授，就住在胡坚家楼下。她的孙子大卫和小卫与胡坚年龄相仿，和朗润园的中国孩子们一起度过了童年。因为混血的缘故，大卫和小卫有着中国人的黑头发、黑眼睛和外国人鲜明的轮廓，十分可爱。

那时顽皮的孩子们总能想出各式各样的游戏，风行一时的便是养蚕。全朗润园乃至全北大的桑树，都被采桑叶的发小们攀了个遍。蚕宝宝越长越大，吃得也越来越多，幸亏园中桑树遍布，尽够采撷。

他们的课业非常轻松，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肆意玩耍，朗润园的每一条小路上都有他们嬉闹的身影，每一个小土坡都有他们“藏宝”的小坑。就像胡坚说的，“那时候一写完作业就满院子疯跑，到了天黑，各家家长就到窗口喊吃饭。有时候我们贪玩，怎么喊都不听，家长就下楼给一个个抓回去。”

而发小们在一起不仅是玩耍，还有很多时间用在了读书上。当时每家都有3、4个孩子，大家每天约定一起到某个人家里串门写作业。8-13号公寓中住了很多北大教授，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家里卷帙浩繁的藏书。胡坚还记得，

在13公寓三层的中文系唐沅教授，就很喜欢给他们推荐名著。

发小们读书的热情就这样被激发了。大家常常一起带着书本，在北大校园里找一处安静的角落读书。白天读不完，夜里即使打着手电筒也要在被窝里读完。家长们也都十分开明，即使在文革时也会借“供批判之用”的名义，将各种小说借出来给孩子看。一本书，我看完借你，你看完借他，就这样传遍了发小们的圈子，再回到主人手上时，早已“读烂了”。

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在文革期间，居然都能读到那么多书！我对世界名著的阅读，像《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之类的，几乎都是在那一时期突击性完成的。这种幸运是朗润园与北大带给我们的，可以说我们幸运地“偏安一隅”了。”

分别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  
在朗润园的生活平静而安稳，胡坚和发小们每天重复着单纯快乐的日子，仿佛时光没有尽头，没想到离别不期而至。

文化大革命袭来，宁静的朗润园也卷入了时代洪流，红卫兵的身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朗润园的各个公寓中。最先与发小们分离的，是外国的叔叔阿姨们。

西语系蔡斯特教授被赶到中关村一个小房子去了，谭玛丽教授被下放到江西干校。文革结束时他们已经很老了，再也没有能够回到 13 公寓里来。

赵玲克娣教授虽然留在了朗润园公寓，但“文革”时也有难逃一劫。胡坚清晰地记得，那天红卫兵冲进房里，把她揪出来，批判她养花的“资产阶级罪行”，并且当着大家的面，把花盆砸碎，把常春藤扯下来，把鲜花踩烂，彻底砸了整个花园。赵玲克娣教授一直低着头，散乱的头发盖在脸上，一言不发，没有人能看到她的沉默的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只是后来，花园败了，她也再没有种过花。

接着，发小们也相继分别。“文革”使得小伙伴们的父母受到了冲击，他们有的去了干校，还有的，像谭玛丽的孙子大卫，就跟着父母去国外了。最后分别的，是朗润园。由于 1976 年受唐山大地震波及，胡坚家四楼的房子裂开了缝，加上爷爷奶奶都已经年龄大了，一家人只能搬出 13 公寓。胡坚对朗润园依依不舍，对发小们也留恋不已，一遍遍地问母亲可不可以不搬，可惜不能如愿。

就这样，胡坚结束了在朗润园 13 年的生活。

这桩桩件件的离别，都是时代使然，大多数人走得匆忙，甚至来不及告别。离开朗润园的这年，胡坚正好高中毕业，时代将她推向了不知名的远方。

她被分配去街道当了工人，恢复高考后又考取了大学。朗润园里曾经的发小们，也都忙着为自己的人生打算，加之通讯方式不便利，一群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几乎也再没人回过朗润园。

重逢 所有回忆，青丝成雪

一个人的一生看似很长，但是真正回顾走过的岁月时，人生又太短。昨天的孩童，今天却变成了老人——当朗润园的发小们再次相见时，心中也充满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特别诧异，也特别可惜：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是小孩子，怎么再一见面，竟然变得这么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错过了这么多……”2012 年 7 月 21 日，朗润园 8-13 号公寓的发小们终于重聚一堂。胡坚现在想起这个聚会，还是很感慨，“如果以 1976 年为一个界限的话，我们分开已经三十六年了。”

三十六年来，发小们的人生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的研究学术成为教授，有的进入出版社当了编辑，有的进



入国企做了职员，还有很多发小都已经退休了。但即使是这样，大家重逢后却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彼此间没有丝毫隔阂。

“那天大家都在抢着说话，都听不清了，我回家觉得耳朵都要聋了。”胡坚笑得停不下来，然后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说，“我们是真的太久没见面了……”

这次聚会后，发小之一周明创建了“朗润园 813 公寓的博客”，供朗润园 8-13 号公寓曾经的孩子们回忆往事。现在这个博客已经有 56 篇博文了。虽然更新的频率不高，但是每一篇文章都情真意切。

欢笑过后，重回朗润园时，胡坚却有了些怅惋：曾经供人居住的致福轩变成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用地；红湖的水已经轻轻浅浅，不复当年的溪深鱼肥；楼下的花儿早已不见……一种“物非人也非”的伤感总在胡坚心头挥之不去。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正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朗润园也一样：如今它的居住功能在慢慢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学术科研。我现在也不太回去了。”

得了在北大工作的“地利”，胡坚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上传燕园的美照，各处的花开得正好。但是胡坚一直忘不掉赵玲克娣教授家，那个在文革中被毁掉的花园——“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看的花园了。”

对于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而言，朗润园最深的意味是感激。

接受了采访后，胡坚有感而发，在凌晨两点更新了她的博客：“朗润园这样的居住环境给予了我什么？真是一言难尽啊！给予我一群可以一起欢乐嬉戏的小伙伴——令我体会到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给予我一个山清水秀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生态教育’浑然天成；使我认识了一群保持了独立人格和高尚品性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做人的标杆尺度；令我博览群书，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了解了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和人性的千变万化。”

在采访的最后，胡坚说：“岁月是会过去的。但我相信，我们都会揣着这份回忆走下去，走向更远的将来。我爱朗润园。并且感谢它。”

来源：北大校友网

作者：李鸿宾

## ■ 大美北大

### 花明叶软燕园春

春神昨夜过燕园，翠步轻移怕月眠。冬去新芽犹嫌冷，春来枯柳亦生烟。春风不醉博雅塔，花雨难湿未名船。隐隐书声伴鸟语，分明佳丽一二三。







摄影：孙耀明 姜南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学员心声

### 上下求索

在大学期间，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良，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在校期间担任班长，罗湖区区长，小组组长，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在班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骨干班委。

在我担任班长时，成功为我们班级举办了“相聚光明、前途光明、永远光明”的大型集体活动，使得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得到升华。这次活动前是在没有前人的经验指导下，完全是通过自己网上找当地资料、实地摸索而取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要么是同学们报名一直拖着，杳无回应，要么时间太赶，报批不及，要么饭店老板报价太高等等。最后，通过自己不断摸索努力，获得了同学们一致好评。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服务同学的能力，我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因此，我始终认为我们继续教育读大学的真正目的仍在于学习，学习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放在首位，这是学子改变命运重要的也是唯一的途径。虽然平时工作繁忙，但我依然会“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学习，相信时间就像海绵，挤挤总会是有的。大一期间，虽然自己所学的是财务类的专业，但我也报考了教师资格证考试并积极备战，希望能学到不同类别学科的知识。为了进一步开拓自己的视野，提高自身素质，我还报考了社工考试以及会计证考试。此外，我还积极参加各种与学习有关的活动和竞赛，以提升自我的素质和各方面的能力。

学习成果的最好体现是成绩，因此，我通过周密的准备，详细的了解，最终让我们班数学考试通过率达到百分之 80 以上。进行数学补习几个月以来，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课题范围广、公式复杂，我们都已经毕业多年，甚至都没学过。在此积极寻找老师和以前有经验的师兄师姐的帮助，迎难而上，最终完成了通过率，取得突破。

大学生活，除了要重视课件语音答疑学习，还应注重第二课堂的实践，因此大一大二期间，我利用空余时间，积极进行 U 站志愿服务。我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学弟学妹提供帮助，带来快乐。帮助别人不一定要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完全可以在学生阶段，有力出力，怀揣着为他人服务的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平凡的事做起，坚持到最后，终会成为不平凡。

在三年期间，我组织过深圳博物馆、荔枝公园游览；重阳节凤凰山爬山活动；皇室派对唱歌、东门聚餐；梧桐山“山在脚下，人在园中”团委爬山活动；“各地特产分享会”，“相聚光明、前途光明、永远光明”活动；“福田体育公园羽毛球比赛及聚餐”；“红树林深圳湾骑行”；以及每次考试完成之后进行聚餐活动。在平时需要语音答疑、做作业与提交作业的时候我都会在群里面发公告或者邮件形

式通知同学们；在期末考试前，我会在学习空间下载好各科复习资料上传到群里供同学们复习准备；在同学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如课件问题、学习问题、系统问题我都会一一在学习空间提问或者问班主任帮同学们解决问题。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用一百倍的信心和万分的努力去迎接更大的挑战，用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耕耘谱写美好的明天！

作者：刘文苑

深圳学习中心

编辑：丁香的花朵